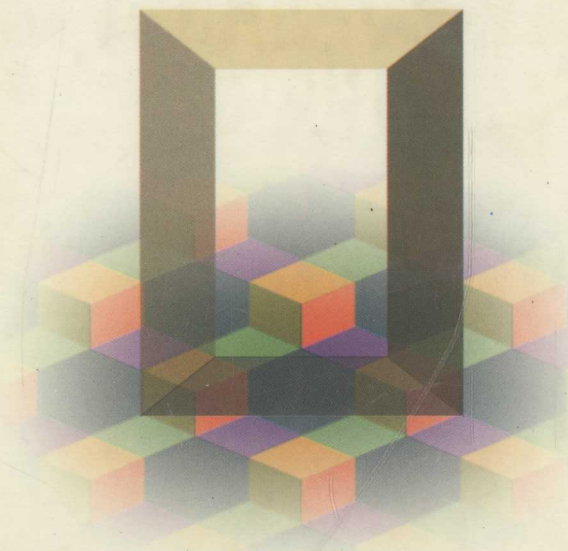


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20世纪 贵州散文史

艾筑生 /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艾筑生/著

20 世纪 贵州 散文 史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谭良洲

封面设计:珑 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 世纪贵州散文史 / 艾筑生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10

(20 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ISBN 7-5412-0879-5

I.2... II. 艾... III. 散文-文学史-贵州-现代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192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1)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3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31.00 元

本 书 受

二〇〇〇年

贵州省出版基金资助

总 序

何光渝

写一部《20 世纪贵州文学史》，是我们的夙愿，也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是贵州人。早在我们从各种文学作品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印象，铸造着我们各自的基本文学趣味之前，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就已经把她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注入了我们的血脉和心灵。

我们是 20 世纪人。当我们站立在这百年更迭、千年交替的门槛之前，回首既往、希冀未来时，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件应该了却、可以了却、必须了却的心愿——

历史的淘汰实在无情。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习见的文学史著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贵州文学的命运即是如此：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我们确实有过！然而，百年过去了，千年过去了，在文学史事实上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的今天，我们仍然没看到有一种对于贵州文学整体的、真诚的描述。临到这世纪、千岁之末，我们还能让这样的命运再落到 21 世纪贵州人的头上？

于是，我们萌生了写一部贵州文学史的愿望和冲动。

然而，我们最终也只是选择了“20 世纪”这样一个时段。这种选择的缘由，一方面是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20 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启发,它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视为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以这种新研究范型的整体性眼光和将文学的现代化判定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基本价值立场,来开始对于贵州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本身就极富挑战性和学术魅力;另一方面,20 世纪的贵州历史和贵州文学历史,也亟需深入的反省和重述,清理那些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更要发掘那些我们过去忽略了的东西。在那些被湮没的东西当中,有许多是珍贵的思想资源,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过去,重建信心,瞻望未来。

在大量搜寻考证 20 世纪贵州文学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尽管在贵州,历史重负与严峻现实的纠缠那么复杂曲折,但总是有一些精神因素在其中活跃着,而文学大概是这些因素保留得最多的一个领域。不少贵州作家的作品,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对于人生的特别感受,某种对于历史的特别理解,表达了某种敏锐的感觉,拥有某种深广的疑虑。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文本”中,从文学世界刻下的深深印痕中,透露出 20 世纪贵州人对于贵州现实和外面世界的感受和关注,对于人和人生的基本生存意义的苦苦寻求。当然,我们所说的“20 世纪”,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刻度。我们的视野,还前移至 1900 年以前的一些时候:1898 年发生的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变革的先声,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就贵州而言,也正是在此前后,开始了其思想文化的启蒙,逐渐将诸如“人”、“人性”和“审美”等现代观念,置于文学图景的中心位置,由此而衍生出后来的百年贵州新文学的历史进程。

自然,在这部书系进入实际操作过程时,我们遭遇到不少困难和困惑。一部贵州文学史著作,与贵州的文学历史并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当然要尽可能客观地对文学作出记录、叙述和评价;但是,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实录”真实的、完整的文学历史过程,哪

怕只是梗概式的描述也不可能。这一方面是因为贵州文学的历史记录和资料的大量散佚,另一方面也同我们选择的原则有关。

首先是这部文学史的体例问题。体例实际上蕴含着著者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及学术取向。我们认为,体例不妨杂用,也就是章学诚说的所谓撰述之书“例不拘常”。我们希望在这部文学史中,存史实、存教训,能够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注意克服那种“全面”、“稳妥”的教科书心态,并避免将文学史写成“史事编年”或“资料长编”。一般而言,治史的关键有二:史识,史料。史识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也不能没有史识的耙梳。一部文学史,要求它既通俗易懂,又准确系统,还要有新意和深度,三者得兼,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们能否在介绍史料的同时,突出作者的史识?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在描述 20 世纪贵州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和演变脉络的同时,兼顾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们力图把所能够找到的基本史料进行搜集排比,对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进行考证;分析研究作家作品时,突出研究者的理论思维,以突出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是研究的重心问题。我们将这部 20 世纪贵州文学史按文体分类,设计为 5 卷,分别为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戏剧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史(尚有文学批评史等未能纳入),并采取以个人著述的方式实施。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研究者自己之所长,追求学问,“决断去取,各自成家”,使每位参与者多年所从事的专门研究能够在一个整体性框架中得以表达,也可以在充分体现作者学术个性的前提下,集中表达我们对于 20 世纪贵州文学的共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撰写某一种文体史,著者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既可以从整个文学思潮演变、影响等角度,也可以从具体文体的艺术形式在贵州的发展、变迁的角度来深入阐述,从而有利于对该文体在贵州百年演变的某些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当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写某一文体史,自然不能完全撇

开“世情”与“时序”。要使我们的文体史不同于一般的大文学史，在把这一文体的演进放在整个时代氛围中来考察时，能否以该文体在贵州的发展作为贯穿线索，写出一点新意和特色，是研究及写作中的关键。

三是研究方法。我们认为，文学史的研究，不应抱残守阙，完全拒绝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不应盲目赶时髦，为“新”而新。我们主张“博取杂用，守旧出新”。方法论的运用，应从具体的对象出发，以我为主，不拘泥于一家一派，选择各自适用的方法和范式。应该看到，无论哪一种方法和范式，都有囿限和理论盲点。对同一文学现象，从不同的理论框架观察，就会发现不同的意义。所谓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叙述是不可能的。每种框架都有自己的理论视野，在撰写文学史时，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历史”都能进入某一理论框架的视野。因此，我们提倡在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时，主要凭自己的艺术感受和理论眼光决断取舍，特别是对一些不为常人注意、或因某种原因而被忽略遗忘的作家作品，要以史料和史识确定其历史地位。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力求填补贵州文学研究的一些空白。重要的首先是把握基本史实：这一阶段的发展概貌，有哪些重要作家作品，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水平。有一些必须介绍的史料，应该有集中明晰的介绍，使整体面貌清楚。在突出文体发展、对文学进程进行描述的同时，有必要为重要的贵州作家列专节，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贵州文学的最高水平。不要只用某种固定的、因袭的批评模式，否则会使我们无法概括一段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历史。

在构思这部贵州文学史之初，我们讨论过这样的学术目标：①从 20 世纪变化中的贵州文学现象中，概括出本世纪贵州文学总体性的历史特征及发展的基本线索；②以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为背景，以 20 世纪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为背景，考察贵州文学，以揭示贵州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与贵州特定地域的历

史联系和影响,揭示文学的地域性特征;③研究贵州文学自身纵向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以把握区域文学的发展走向和基本格局;④研究贵州文学中各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辩证发展的历史线索和轨迹,以揭示文体本身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矛盾及演变规律;⑤以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的方法为基础,融合贯通各种传统的和新的研究方法,力求在贵州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和方法上有新的见解和突破;⑥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力求填补贵州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在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科学性上,力求达到新的水平。我们当然明白,我们的能力未必能使这些心向往之的目标如愿以偿,我们的选择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即使这些目标都能实现,这部贵州文学史也不可能涵盖贵州全部文学的历史。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会有终极性的结论。每一种“最新结论”,都可能被后来更为完善的认识所否定。文学作为一门相当特殊的人文学科,情况更为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容易随着时代而演变,并不断地校正自己。我们始终意识到,在我们写下的这部贵州文学史的“文本”之外,还有一个实际存在着的贵州文学历史,我们不可能永远是它的唯一书写者。

都说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人类在取得了空前进展的同时,也遭受了空前的挫折和磨难。也因此,20 世纪的世界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也总是被一种骚动不安的强烈的焦灼所冲击、改变和遮掩;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就纳入全民族的危机感之中,并主要在伦理层次和政治层次上体现。20 世纪的贵州文学,由于这片地域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这种表现尤为显著而滞迟。当我们在著述这部贵州文学史时,面对大量的作品,确实感到,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20 世纪的贵州文学同样如谢冕所言,是一种“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也因此,当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变革时期,近 20 年精神

生活日渐活跃,并开始为新的思想主题的形成提供生存生长空间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贵州文学,在走向文学自身本身的同时,不要遗忘自己的历史,更不要放弃文学精神立场而对现实不再承诺,不要让文学的双翼远离这片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土地——我的苦难而坚韧、古老而年轻的贵州高原。

写这部 20 世纪贵州文学史,于我们、于贵州,都是第一次。草创之举,筚路蓝缕,甘苦自知,遗憾不少。即使用再多的自我表白,也无法代替读者及学界对这部“书系”的公正评说。在此交代一下我们研究的大体思路,或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批评。

1999 年 10 月 1—3 日

共和国 50 周年庆典之际于贵阳

目 录

总 序	何光渝(1)
绪 言	(1)
第一章 文学革命思潮影响下的贵州文学及其散文创作	(3)
第二章 承前启后的创作——从《西洋杂志》看黎庶昌散文的艺术特色	(8)
第三章 20 世纪 20 年代前的贵州散文创作	(17)
第一节 议论散文的勃兴	(18)
第二节 叙事散文的发展	(22)
第四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贵州的散文创作	(24)
第一节 30~40 年代贵州散文创作的概况及其特征	(24)
第二节 王若飞散文	(28)
第二节 黄齐生散文的艺术特色	(33)
第三节 谢六逸的散文创作	(39)
第四节 蹇先艾的散文创作	(53)
第五节 方敬在贵州的散文创作及其艺术特色	(70)
第六节 卢葆华的散文创作	(77)
第七节 吴鼎昌与张道藩的散文创作	(83)
第八节 平刚的记叙散文和他的笔记散文	(94)
第九节 周素园的散文创作	(105)
第五章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的贵州散文创作	(120)
第一节 50 年代贵州的散文创作	(120)
第二节 周素园《光明日记》的独特价值	(130)
第三节 蹇先艾建国初期的散文	(133)

第四节	60 年代贵州的散文创作	(136)
第六章	新时期以来的贵州散文创作	(140)
第一节	潘年英和王尧礼的散文创作	(162)
第二节	张克的《贵州真山真水行》	(174)
第三节	王蔚桦的散文创作	(177)
第四节	秋阳的散文创作	(181)
第五节	何士光的散文创作及艺术特色	(186)
第六节	方庸的散文创作	(194)
第七节	张毕来散文	(212)
第八节	陈沂散文	(219)
第九节	唐莫尧的笔记散文	(227)
第十节	戴明贤的散文创作及艺术特色	(244)
第七章	建国以来的贵州杂文创作	(261)
第八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贵州杂文创作	(273)
第一节	《贵州杂文集》的新的拓展	(275)
第二节	刘学洙的随笔杂感	(283)
第三节	高宗文的杂感随笔	(293)
第四节	龙炳成的杂文创作	(308)
第九章	建国以来贵州的报告文学创作	(317)
第一节	建国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贵州报告文学创作	(317)
第二节	80 年代贵州的报告文学创作	(327)
第三节	90 年代贵州的报告文学创作	(336)
第四节	唐流德的报告文学创作	(340)
第五节	李起超的散文报告文学创作	(345)
第六节	何光渝的报告文学创作	(354)
第十章	新时期以来贵州纪实文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	(368)
结 语		(405)

绪 言

中国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是诗的大国，中国也是散文的国度。在先秦文学发展史上，《诗》、《骚》与诸子散文的双峰并峙，奠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础。而诸子散文中那些极富个性的发挥，机智而雄辩，诙谐而潇洒，既质朴厚重又华丽辉煌，不但是中国文学创作的源头，而且是中国思想的宝库。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散文就是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的代表也是恰如其分的。正因有了这种光荣的传统，所以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里，数千年来，真是群星闪烁，灿烂辉煌。而我们研究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从中不难发现，在散文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一般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夺席谈经”的桃达坦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风范与诗酒文章，唐宋八大家的汪洋恣肆，晚明小品的超凡脱俗……直至新文学运动中议论散文的发端，鲁迅散文的浩瀚，其中还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林雨堂、朱自清、冰心等等的投入，中国的散文创作，真是洋洋大观。

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散文”的概念，一度是包容极大的。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散文”是一个与韵文、骈文相区分的过于宽泛的概念。真正产生“文学散文”的界定，是在新文学运动的发轫阶段。最先的论述，还仅仅是将“文学散文”与“韵文”相区别，“小说”等等也还包容在“文学散文”之内。例如刘半农、傅斯年分别发表于1917年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怎样写白话文》。1921年，周作人发表《美文》，提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

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着美文,这里边又可分着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相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他又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些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王统照在 1923 年发表《纯散文》一文中明确提出:“纯散文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所以作纯散文好的极少。”1924 年,王统照又写了《散文的分类》一文,更进一步将“文学散文”的概念作了探究。此外,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还有无数文学先行者的不懈的努力与实践,“文学散文”在 20 世纪繁衍开来。但与之俱来,又有一个更进一步区分和发展的问題,这就是“纯散文”与“大散文”的不同。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散文”的概念,是有别于“纯散文”的。即既包含“纯散文”的记叙散文和抒情散文,又包含报告文学与杂文。以此来衡量和规范 20 世纪贵州散文创作,应该说还是很恰切的。在远离中心文化的边远省份,一样也拥有文学花朵的芬芳。与京华要地的景观相比,或许它并不绚丽多彩,但几代文人的心血浇灌,筚路蓝缕的开拓,在原先荆棘丛生的荒野,毕竟也培育出几许馨香。《20 世纪贵州散文史》将以作品为径去寻觅贵州文学散文的发展脉络,努力勾勒出这一片文学的风景。

第一章 文学革命思潮影响下的 贵州文学及其散文创作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无论从哪一角度说,都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发展阶段。推翻帝制、再造共和、抵御外侮、人民解放。百年风云,沧桑巨变,可歌可泣。一般说来,治文学史的专家学者都把“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始。但思想的波澜并非在一夜之间形成,中国新文化思潮的变革的基因应该说奠基在辛亥革命的前后。梁启超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变革思潮的巨擘。他与康有为由时代的精英而逐渐走向保守不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每个时期都保持了思想的敏锐利,始终不渝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终其一生都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以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长期的社会实践,使革命家认识到唤起民众觉醒的重要,梁启超尤为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本来被认为是稗官野史、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被革命家分外推崇。梁启超分别发表于 1898 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 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15 年的《告小说家》是他最集中、最深刻的三篇文学理论文章。特别是梁氏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

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固然,梁启超是在论小说,但却是他根本的文学主张。而更为重要的是,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不难看出,梁启超的上述主张对中国文学的一以贯之的重大影响。梁氏的影响,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党不同流派的文学主张中寻觅,当然如若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探求,自然是遵循“文以载道”的法统。这种影响,固然使包括文学散文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有所依归,但毫无疑问,从另一角度看,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也可能使文学创作的路子过于狭窄。就中国文学散文的创作而言,近百年的创作实践,大致也就在遵循梁氏理论与有所不同的文学主张间移动。因为散文这种文体,强调真实。又因为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实践,一直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等的精神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强调表现“大我”,实际上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张扬梁启超的文学主张。而在创作中对风格流派的追求有所表现,尤其在文学散文的创作中,深层次的因素既包含着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向往,又自然体现出个性的适当舒张。当文学散文创作上对前者侧重,其表现多为议论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的繁荣。而当创作上对后者有所依待,其表现则是抒情散文和知识小品的昌盛。事实上,在文学散文的百花园中,有所偏废的都不是健康发展的路子。

在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文学主张风靡文坛,而梁氏如椽巨笔其文风也倾倒文坛。偏僻的贵州与精神中枢的汇聚点京城尽管距离遥远,但在本世纪初受梁氏政治文化理论的影响却并未稍让他人,而在一定程度可说更为强烈。这并非大胆假设,而是有着令人信服的合乎逻辑的事实依据的。梁启超与贵州政治文化界的关系确实深远。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如果没有贵州先贤李端棻,就很难有梁启超在中国政坛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脱颖而出。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贵阳人李端棻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没有他的慧眼识人,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康有为、梁启超是否能

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演出那些激动人心的活剧？李端棻生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 1833 年），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却是光芒四射。他为贵州、更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文化科技的传播殚精竭智，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中坚。清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李端棻主持广东乡试，在众多学子中发现梁启超的试卷，以为融铸经史、识见不凡、而文风清朗、议论风发、尤为难得，于是取在前列。谁知在放榜之时才知梁启超竟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李端棻大为赞叹，于是托人作媒，将自己的妹妹嫁与梁启超，文坛内外，一时传为美谈。但李端棻与梁启超并非仅仅是一种亲戚的友好关系。李端棻和康、梁不但是志同道合的师友，而且，李端棻是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举荐者。在戊戌变法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李端棻应该说是比康、梁更为重要的人物。这并非是出于对贵州乡贤的偏爱。事实上，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李端棻擢升礼部尚书，“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帝”，在百日维新中，李端棻以其地位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各个方面对变法给予支持。正如梁启超所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而康有为这样评价：“惟爱国如在疾兮，乃爱才而倒屣。策变法而累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祭故礼部苾园李公文》）李端棻在政治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还集中体现在他极为重视教育的改革、科学文化的传播、人才的培养。早在变法前的 1896 年，在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李端棻就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又请在各省、府、州、县设立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与此同时，李端棻还提出开译书局、广立报馆等等先进主张（这些主张，已经包容了文学创作的内容），站在时代前列。1898 年变法初始，光绪即如李端棻所请，准予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从此以后，北大就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堡垒。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变法失败，李端棻在流放新疆途中遇赦放回原籍贵阳，仍然没有放弃维新的思想，仍然坚持为家乡子弟传播